

“苏学盛于北”与金词的发展历程

胡梅仙

(广州大学 人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从大定、明昌词的时代、地域、多元民族文化背景论述了“苏学盛于北”与金词的发展历程,即苏学在金的传播、苏轼“随物赋形”的理论和创作实践对金词的巨大影响、金词坛对苏学超然旷逸神韵的承继和金初蔡松年与金中期赵秉文以及金元之际的元好问对苏学选择性的承继。分析认为:金文坛的发展既是苏学传播的过程,也是苏学在金的发展和不断被选择的过程;金文学与其说承继的是苏轼的诗词传统,不如说承继的是苏轼学说中所表现出的向四面破出的多重思想。

关键词:“苏学盛于北”;传播;承继;金词

中图分类号:I222.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3)01-0117-08

金朝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它从一个结草记事的野蛮民族迅速成长为“有周成康、汉文景之风”和“欲以文治太平”的盛朝,除了统治者“借才异代”、重视文治的传统外,与金对苏学的接受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般学者研究金词时必须谈到苏轼词对金词的广泛影响,实际上我们更应该从苏学的实质精神理解苏轼对于金词的意义。在少受儒家文化束缚的金政权统治的北方,文化所呈现的状态和精神实质自与苏学的儒、道、释多维并存的混杂有着一脉相承之处。金文学与其说继承的是苏轼的诗词传统,不如说继承的是苏轼学说中所表现出的向四面破出的多重思想,金词也不例外。笔者主要从3个方面阐述苏学与金人诗词的互动。

一、苏学在金的传播

东坡之后,北宋末继承东坡“以诗为词”的词体观念发扬其豪放词风最力的是贺铸。贺铸和苏轼有过交往,在《庆湖遗老诗集》中有8首怀念苏轼的作品。贺铸步武东坡,在创作中实践了东坡“以诗为

词”的观念,扩大了词的内容和表现手法,给词坛吹入了一阵清新刚健之风。张耒的《东山词序》谓其词“是所谓满心而发,肆口而成,虽欲已焉而不得者”。贺铸的名作《六州歌头·少年侠气》、《将进酒·小梅花二首》的英雄豪壮气势“可以说是上承苏轼《密州出猎》的《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下开南渡、南宋词人如朱敦儒、张元干、陆游、张孝祥、辛弃疾、陈亮等力主抗金的爱国词篇”^[1]。近代的龙榆生认为,贺铸词“无论就豪放方面,婉约方面,……乃至胡氏(胡适)素所主张之白话方面,在方回词中盖无一不擅盛场,即推为兼有东坡、美成二派之长,似亦不为过誉”^[2]。《小梅花》之二(“缚虎年”)得到夏敬观先生的高度评价:“稼轩豪迈之处,从此脱胎。豪而不放,稼轩所不得学也。”^[3]其后的朱敦儒词比贺铸词更起着词风承前启后的作用。朱敦儒词中日常生活场景的出现及其词口语化的表达,反映出他词的“艺术视野、词中生活世界的扩大和审美趣味的世俗化、生活化、日常化”^[4],其词浅白如话,明朗飘逸中透露出对于自然风格的推崇。“在北宋与南宋之间则有朱希真,作品多自然

收稿日期:2012-09-15

作者简介:胡梅仙(1969-),女,湖北咸宁人,副研究员,文学博士,博士后。

意趣，不假修饰而丰腴天成，即汪叔耕所谓多尘外之想是也。”^[5]贺铸、朱希真词中的口语化趋势特别是朱希真词中日常生活场景的出现，与金中期词崇尚情性的自然表达、现实生活场景的出现以及与其内容表达相一致的描写性笔触的出现，表明其也是词体本身发展的规律使然。从元好问的“效朱希真体”（《鹧鸪天·八》），也可看出朱希真词在金的影响。

金初，以蔡松年为代表的宋词人主要以高情远韵来排解心中的抑郁和忧愁，金中期词更多地充满世俗的生活氛围，是雅词和俗词融合的时期，表现出转型时期的词在俗文学的冲击下呈现不同于传统词的新面目和不可避免的粗疏之态。东坡词渊博大思想意蕴在金中期被时代的牧歌氛围冲淡为一种潜藏于民族深层的超迈旷逸底蕴。金初崇苏如果按该阶段的接受取向应与“借才异代”期词人用旷逸来排忧有关，而金中期词在金初崇苏的学术源流中旷逸已成为一种基调，它的分化在词中表现为承平心态下向多元的视角、多重的人生体验有意或无意的转化，其间词有向北宋晚期词风靠拢之势。金初词坛皆是宋儒，思乡情愁和出处困顿衍化成或者是吴激词的幽婉哀伤或是蔡松年词的欲超脱而不得的尘外之思。随着承平时代的到来，“国朝文派”的兴起，属于金自己词人的出现，其真正的文学从大定、明昌始。与之相适应的是词体表现形式的改变，与闲适的时代氛围相适应的是词体题材的扩大和弥漫着一种对人生自适的追求。从东坡的“以诗为词”、贺铸词的口语化趋势到朱敦儒的明白晓畅地追寻闲散超逸之作可以看出，金中期词人已摆脱金初词人的困闷心境，随之而来的是对北宋词的回归。蔡松年词虽“开金百年词运”，主要是为承苏的词风开辟了金词坛的总体风格取向。因苏学的博大精深和“芜杂”，金初蔡松年词主要承继的是苏词的旷逸一面，在金中期词坛对于苏词的崇尚自然一面有很好的体现，这又与朱敦儒词的超凡脱逸、清新自然有着一脉相承之处。“余于词所爱者三人焉。盖至东坡而一变，其豪妙之气隐然流出言外，天然绝世，不假造作。二变而为朱希真，多尘外之想，虽杂以微尘而其清气自不可投。三变而为辛稼轩，乃写其胸中事，尤好称渊明。此词之三变也”（汪莘《方壶诗余自序》）。由此可以看出，汪莘对三人词中自然、情性的崇尚。北宗词和南宗词的区别在对情性的追崇和词传统模式的追崇（包括应景之作的虚泛与传统意象和氛围的表达等），这2个方面应是一个大的分

别。北宗词对苏东坡、朱敦儒词的承继主要在对其词体革新观念的承继上。假如金初蔡松年词还有着大量的苏词、苏韵，那么金中期的词作中已很难找到传统词的意象和语境，期间的词已脱离传统词的羁束，在词的意象和意境上已表现出一种真正有感随心而作的风貌。辛稼轩是由北开南词人，北人的自然质朴稟性对于其词风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辛派词人毕竟在南宋词坛不占主流位置，赵维江关于北宗词和南宗词的定义对于在总体上统观词史的发展有着很大的意义，特别是对于相峙的宋金词坛，也是对于长期豪放婉约之分存在着局限性的一种更为合理的词派划分。对于情性追崇随之带来的南北宗词派风格的不同，是南北宗词派的主要差别，表现在总体面貌上的改变，就是一种北方的气质和精神的显现。

金文坛的发展既是苏学传播的过程，也是苏学在金的发展和不断被选择的过程。宇文虚中与苏轼同为蜀人，其“穷愁诗满筐”试题云：“语不复锻炼，要之皆肺腑中流出也”，“蔡则疏快平博，雅近东坡”^[6]。郝经推党怀英“岿然度越追李唐，诚尽简质辞雍容。斫雕剥烂故为心，畅达明粹理必穷。……浑然更比坡仙纯，突兀又一文章公”（《陵川集·读党承旨集》卷九）。郝经称赵秉文“金源一代一坡仙，金銮玉堂三十年。泰山北斗斯文权，道有师法学有渊”（《陵川集·闲闲画像》卷九），“中州隔绝，困于戎马，风声习气，多有得苏氏之遗，其为文亦曼衍而浩博矣”（虞集《庐陵刘桂隐存稿序》）。由此可以看出，苏学在金传播的主导地位和一脉相承的影响。

《金史·褚承亮传》载：“宋苏轼自定武滴官过真定，承亮以文谒之，大为称赏。”^[7]金统治者为了顺应民心，“褒崇元祐诸正人，取蔡京、童贯、王黼诸奸党。”^[8]苏学在金的传播除了以上因素外，更重要的是苏学中的旷达契合了金初词人的心理需要以及北方民族的传统审美理想和北方的文化特质与苏学中的超然旷达的内在一致性。苏轼在民间“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坡诗，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韵”（朱弁《曲洧旧闻》卷八）。

元好问的《中州集》卷五中曾载高宪“自言于世味澹无所好，唯生死文字间而已。使世有东坡，虽相去万里，亦当往拜之”^[9]。元好问《续夷坚志》亦载有一轶事云：“卫文仲，襄城人，承安中进士。性好淡泊。读书学道，故仕宦不进。平居好歌东坡赤壁词。临终沐浴易衣，召家人告以后事，即命闭户。危坐床上，诵赤壁词，又歌末后二句，歌罢怡然而逝。”

赵秉文在《跋东坡四达斋铭》一文中谓:“东坡先生,人中麟凤也。……观其胸中空洞无一物,亦如此斋,廓焉四达,独有忠义数百年之气象,引笔著纸,与心俱化,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其有得于此,而形之于彼,岂非得古人之大全也耶。”^[10]其在《大江东去》追和东坡赤壁词中又云:“我欲从公,乘风归去,散此麒麟发。”刘祁认为,赵秉文晚年诗歌“多法唐人李、杜诸公”,其词中既可以看出东坡的超旷,也杂糅着李白的飘逸潇洒。而“苏始学刘禹锡,晚学李白”(《苕溪渔隐丛话》卷四二),其间可以看出苏轼和李白诗风的一脉相承处。《金史》载:“(完颜)承晖生而富贵,居家类寒素,常置司马光、苏轼像于书室,曰:吾师司马而友苏公。”^[7]苏学已成为金人文化中的一种底蕴,融入金士大夫、文人的血液之中。金初使金被扣留的南宋诗人朱弁曾与晁说之、参寥等名流交往过,多得元祐传闻,在金17年,著有《曲洧旧闻》10卷、《风月堂诗话》3卷,因对苏轼的追崇,其中颇多苏东坡、黄庭坚等元祐党人言行。再就是另一入金宋人施宜生,曾“从赵德麟游,颇得苏门沾丐”^[11],施宜生《黄州吊东坡》一诗云:“文星落处天应泣,此老已知吾道穷。事业漫夸生仲达,功名犹忌死姚崇。”^[12]由此可见,苏轼在金人心中已不是一个传统的文人形象,而是被作为一种精神来崇拜。

随着金中期承平时代的到来,金土地上自己成长的诗人已无金初宋儒的去国之悲、夷夏之辨的困扰,对于苏学的承继主要是基于对其超旷之心的追崇,与承平时代对于个体自适的自由境界的追求又有着内在的一致,而不是如金初词人借之解忧的情怀,所以金中期词主要承继的是苏学中自然平淡的一面。王庭筠词“间涉幽峭之笔,绵邈之音”^[13]透露出清新质朴的韵思,至“明昌、承安间,作诗者尚尖新”^[8]与苏学中的次韵险韵之作以及苏轼诗词中的新奇尖巧之风有关。赵秉文有评王庭筠晚年诗作“才固高,然太为名所使。每出一联一篇,必要使人皆称之,故止是尖新”^[8],其晚年诗作现多已不存。李纯甫说:“东坡变而山谷,山谷变而黄华。”^[8]由此可以看出,金人已不满足于其间一脉流传、契合北人文化传统和审美观的自然朴质之作,有以尖新奇巧为学问的倾向。王寂词以自然质朴、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见称,其诗也偶有追新逐奇之作。从现存金诗来看,大部分还是自然平淡之作,金文人追奇索新的倾向在词中不显。金末对苏学的承继从遗山文论对苏轼的尊崇和其词可知遗山对于苏学一脉相承的影响。“子美夔州以后,乐天香山以后,东坡海南以

后,皆不烦绳削而自合,非技进于道者,能之乎?”^[14]元遗山曾称道:“乐府以来,东坡为第一,以后便到辛稼轩。”(《遗山自题乐府引》)金人步韵苏诗或集苏句,往往用的都是东坡渡海以后的那些在平淡之中蕴含至味的作品,同时更深一步地体现了近古人文主义的觉醒以及随之带来的对于自然的追寻以及个体自我独立的意识。东坡渡海之后达到的超脱尘世而不弃世的境界,对于要求着情性解放的金人,其间透露出浪漫主义的自我意识,应是金人喜好东坡词的潜在原因。

二、苏轼“随物赋形”的理论和创作实践对金人诗词的巨大影响

北宗词呈现着对传统词的双重背离:(1)对从晚唐开始的词为花间尊前艳语的传统词学观的背离;(2)对宋词中宋调的背离。随着乐谱的失传,词逐渐成为案头文学。金词可谓是“无事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艺概》),在少受儒家文化影响的金源、多元并存的文化空间使金词从金中期始就表现着与传统词迥然不同的风貌,完全脱离了传统词的语境和意境,不仅表现的内容趋向于世俗化、生活化,贯穿于其中的气息清新自然,而且因之带来的口语化、随意性的表达让金中期词表现出与金初词不一样的风貌。发轫于唐代中期的新儒学运动以及北宋的崇儒思潮被视作理学的促发机因和思想前驱。在宋调影响下的宋词必定留着儒家思想的影子,而金中期词已是一种完全表现自我的文学,不论是表达主体,还是描物刻绘,都看不出身在魏阙心在朝野的儒家济世之心。与金诗相比,金中期词对传统的脱离要大很多。词历来是抒发自我心曲之文学,金人有感而写、任意而发的词作对于主体心性的自我抒发使金中期词完全背离了传统,像是口语化又像是日记的随意,让我们看到了词脱离传统并与诗合流的“诗词同一”的必然趋势。这种任意表达加入了一些以往词不见的新意象、新语境,不可避免地有着粗疏之弊,对词体艺术在承继中的背离无形中成为一种突破,表明来自于世俗的平凡生活对于远离世俗之外的词体艺术的冲击。

金中期词虽有部分的慷慨豪放之辞,这种豪放却被清旷冲淡,使承苏的豪放一派在承平时代的环境中发展了苏词中清旷超逸的一面,这种自然超逸直至金末才转化为家破国亡的沉痛之音。苏轼词有士不遇的哀感,金中期词人却是一种纯粹的精神皈

依要求,是一种对自然本身的、人生适意的真正向往。无论是身居高职或者山野闲人,这种追求竟成为他们不可缺少的一种精神归宿。金中期词的闲适追求又可分为2种:(1)纯粹的田园之音,表现出对平凡生活的闲适散淡情趣;(2)豪气之词,其词无一例外地透露出自由疏散、超凡脱逸的神韵,与其对田园隐逸的向往又有着内在的一致。

金代“在词论方面首先为苏词一振旗鼓之雄的,是王若虚”^[15]。“陈后山谓‘子瞻以诗为词’,大是妄论。而世皆信之,独茆荆产辨其不然,谓公词为古今第一。……公雄文大手,乐府乃其游戏,顾岂与流俗争胜哉!盖其天资不凡,辞气迈往,故落笔皆绝尘耳。”(王若虚《滹南诗话》)王若虚对苏学中的次韵险韵之作却持批评态度,提倡文学要“与元气相侔”,主要指感情的真挚、形式的自然天成。王若虚认为黄远不如苏轼:“山谷之诗,有奇而无妙,有斩绝而无横放,铺张学问以为富,点化陈腐以为新,而浑然天成,如肺肝中流出者,不足也。此所以力追东坡不及欤?”“元祐以后,诗人叠起,不出苏黄二家。而黄之畦径风格,尤为显异,最足以表宋诗之特色,尽宋诗之变态。”^[16]方东树曰:“山谷死力造句,专在句上弄远,成篇之后,意境皆不甚远。”金末对苏学的反思是辩证的,主要是反对苏学中被江西诗派凸显的生新瘦硬倾向,其对苏学及江西诗派的反思还表现在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中:“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

纵观金词坛,除了表现为在精神上对苏学超然旷逸神韵的承继外,苏轼“随物赋形”的理论和创作实践对金人诗词也有着巨大影响,对“物”的追崇对于金人来说有着深刻的历史时代和文化背景。北方民族是一个崇实的民族,他们重视实实在在的事物,或是融情入景,或是情景交融,让人感觉到是真实的,而不是想象的,由此带来独特的生活体验、因物而感的个体经验,使金词表现出不同于传统词的语言特色、语境氛围;同时也是对北宋末空谈义理之风和江西诗派生拗追新词风的反拨。儒家道统的影响使诗乃至词历来倾向于以抒情言志为主,金处于多元文化碰撞的空间里,自然表现出脱离传统诗词抒情言志的倾向,体物描绘构成金中期词的主要特色。

朱弁的《风月堂诗话》对杜甫入蜀诗的高度评价,着眼于这些诗作的实历性质和审美体验性,对东坡贬海南之后的诗作,更是认为“鲁直亦瞠乎其后者矣”(朱弁《风月堂诗话》),是因为东坡的亲历人生苦海及独特的人生体会。王若虚赞“乐天之诗,情

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殆与元气相侔”,认为东坡诗如行云流水,而山谷诗拘泥于“斤斧准绳”、“高谈句律”为法所限,所以力追东坡不及。元好问也是赞“子美之妙”,正在“观其诗,如元气淋漓,随物赋形”,对其入蜀诗也是评价最高。

“随物赋形”是苏轼最先提出的,说明主体和客体的一种天然融合,但“物”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金人重视因物所感,不发空泛的言论,有对文学的想象、空灵成分的摒弃趋向,使金中期词来自于生活,却缺乏艺术最重要成分想象的作用;使金中期虽追慕东坡神韵,却达不到东坡诗词的浑然天成境界。

三、金词坛对苏学超然旷逸神韵和对苏学选择性的承继

苏轼的文学思想、创作理论及具体的诗词作品,已融入金人的文化构造中,这与苏学的博大精深、蕴涵着阐发的无限可能性有关。金初的蔡松年、金中期的赵秉文以及金元之际的元好问,即是金代词坛中步武苏词的3位代表。

蔡松年是金初最得苏学精髓的词人,其词超凡脱俗的神韵与苏词中超然物外的气度极相近,魏道明注《明秀集》亦多以东坡词证蔡松年词。“魏注虽有穿凿附会之嫌,但说明当时人就已经意识到了蔡松年词与苏轼词之间的承继关系。他们的审美倾向和词学渊源为整个金词定下了基调。”^[17]蔡松年(1107 ~ 1159),字伯坚,真定(今河北省正定县)人,仕金由行台尚书省令史至右丞相,封卫国公。所居镇阳别墅有萧闲室,因自号萧闲老人。蔡松年虽身居高位,儒家的出处原则使他一生都处于心灵的煎熬之中,他崇尚的是“醉语嚼冰雪,樽酒玉浆寒”^①(《水调歌头·浩然生朝》)的天人合一的诗性境界。蔡松年词因皆来自于心灵煎熬和对无束境界向往的深刻体会,其词才有不同于传统词(包括苏轼词)的意象和新鲜语境,在其词中已具备金词的特有面目。“真正开有金百年词运者,实惟蔡氏一人而已。其《明秀集》追步眉山,雄爽高健,为后人提供了学苏的第一个蓝本。”^[18]蔡松年词的最大特色是意境的铸造,中国古代文人一般注重在诗中营造意境,追求言尽意无穷的境界。而整部《明秀集》就是一个诗人幻想中的意境世界,其中的冰雪意象、“风琴月

① 本文引用的金词全选自唐圭璋的《全金元词》,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笛”、“松窗竹径”、“竹西歌吹”等正是词人对高洁品格和自由萧散生活的向往。这种向往因不得而显得更加痛苦、深沉和执着,表现在词中是词人心向往的超凡脱尘的境界,该境界正是词人在生活中不能得的一种心理补偿。“我们常常发现现实无法满足我们的愿望,于是就保留了一种幻想的生活,我们在这种幻想的生活中满足自己的愿望为弥补现实中的缺陷。”^[19]蔡松年词正是他欲超越世俗和现实自我的精神独立的象征物。在其词中,焦灼的心情化解在无知无觉、冰清玉洁的自然意象中。自然与人的亲和既表现着人作为异己力量的孤独,又是人希望在天地中独立显现并融入天地无形之中寻求保护的需要。现实和幻想、优美和困顿、分离和融合赋予了山水神性,人的神性在面对山水时正越过无限的时空,希图在那一霎那间永恒。如蔡松年词:“我有一峰明秀,尚恋三升春酒,辜负绿蓑衣,为写倦游兴,说与水云知”(《水调歌头·送陈咏之归镇阳》)。“枯木人忘独座,白莲意可相寻。归时团月印天心,更作逃禅小饮”(《西江月·古殿苍松》)。“上园亲友,岁时陶写欢情,糟牀晓溜东篱侧。手把一枝香,作萧闲闲客”(《石州慢·京洛三年》)。“镜里流年春梦过,只有闲身难得。挥扫龙蛇,招呼风月,且尽杯中物。他年林下,会须千里相觅”(《念奴娇·倦游老眼》)。“明秀高峰人去后,冷落清辉绝壁。花底年光,山前爽气,别语挥冰雪”(《念奴娇·倦游老眼》)。蔡松年词有欲超脱而不得的苦涩,有欲萧闲却时时无法摆脱出处的困惑,只有寄心灵于另一片自己的想象天地,以酒沉醉,与魏晋名士、东坡诗魂沟通,获得生存的理由。蔡松年词因他特殊的人生经历使其难以真正达到东坡词“一笑六根净”的境界,其中只感到清茶的微苦、凉风的微冷:“醉语嚼冰雪,樽酒玉浆寒”(《水调歌头·浩然生朝》)。“一夜蓬莱清浅,欲守平生黄卷,冰雪做生涯”(《水调歌头·丁年跨生马》)。“一支梅绿横冰萼。对淡云,新月炯疎星,都如昨。……微官束置高高阁,便归来,招我雪霜魂”(《满江红·端正楼空》)。对冰雪的钟爱和以冰雪自托,是其萧闲追慕高洁品格的表现。“在艺术里,这些感性的形状和声音之所以呈现出来,并不是为着它们本身或是直接现于感官的那种模样、形状,而是为着要用那种模样去满足更高心灵的旨趣,因为它们有力量从人的心灵深处唤起反映和回响。这样,在艺术里,感性的东西是经过心灵化了,而心灵的东西也借感性化而显现出来了。”^[20]蔡松年正是通过自然山水的人化,发现了自

己通往精神完美的可能,其词借助于自然山水的排忧,对金中期词兴起的田园牧歌情调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萧闲便归去,此图清绝。花径酒垆身自在,都凭细解丁香结。尽世间、臧否事如云,何须说”(《满江红·梁苑当时》)。“何须说”让蔡松年词透露出焦灼欲说的痛楚,才有其词至深的心灵挣扎于锋尖上的光芒,这种光芒被外表的旷达掩饰,酿造了蔡松年词不同于传统词面目独特的心灵意象和语汇,这种独特的心灵体会借助于表达上的真实自然使其词开金一代词风。

金代词人追和苏词最多的是苏轼的《念奴娇》赤壁词:蔡松年的《念奴娇》(倦游老眼)、《念奴娇》(离骚痛饮)和赵秉文的《大江东去》(秋光一片),蔡松年词和赵秉文词中最得东坡神髓的却是东坡的超凡脱逸与自然合一的精神境界。赵秉文(1159~1232),字周臣,自号闲闲居士,滏阳(今河北省磁县)人。登大定二十五年进士第,累迁礼部尚书、翰林学士。元好问《赵公墓志铭》称其“文出于义理之学,故长于辨析,极所欲言而止,不能绳墨自拘。七言长诗,笔势纵放,不拘一律。律诗壮丽,小诗精绝,多以近体为之。至五言古诗,则沈郁顿挫似阮嗣宗,真淳简淡似陶渊明。……闲闲之学与东坡最相似”^[21]。赵秉文对苏轼十分推崇和仰慕,其《东坡真赞》:“入海簸弄明月玑,归来貌悴文益奇。荒坟不朽骨与皮,何况闻望江河驰。……壁间倏睹轩须眉,无乃示吾横气机。裹粮问道往从之,人言画图君绝痴。”^[22]其特别是对东坡渡海之后平淡中见真淳的文章更是赞赏不已。赵秉文在《跋东坡四达斋铭》一文中认为,东坡“其文似《战国策》,间之以谈道如庄周;其诗似李太白,而补之以名理似乐天;其书似颜鲁公,而飞扬韵胜,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窃尝以为书仙”,其在《答李天英书》中云:“尝谓古人之诗,各得其一偏,又多其性之似者。……太白词胜于理,乐天理胜于词,东坡又以太白之豪、乐天之理,合而为一,是以高视古人,然亦不能废古人。”^[22]赵秉文《水调歌头》:“四明有狂客,呼我谪仙人。……我欲骑鲸归去,只恐神仙官府,嫌我醉时真。笑拍群仙手,几度梦中身。倚长松,聊拂石,坐看云。”以及“扣舷长歌,嫦娥欲下,万里挥冰雪。……淡淡长空今古梦,只有归鸿明灭。我欲从公,乘风归去,散此麒麟发。三山安在,玉箫吹断明月”(《大江东去》),都带着明显的东坡神韵。承平时代赵秉文的仿苏词及其他词都明显受到苏词的影响,不仅意象、语言风格类似,而且在精神的超脱方

面真正达到了胸蒂无尘的境界,只是这种超逸因缺乏挫折感而显得意蕴不深。除文化、士人心理因素外,承平时代的牧歌氛围也是这种超逸境界滋生的源泉,对于自适的追求在金中期词人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近人陈匪石《声执》卷下云:“金源词人以吴彦高、蔡伯坚称首,实皆宋人。吴较绵丽婉约,然时有凄厉之音。蔡则疏快平博,雅近东坡。”^[6]蔡伯坚词的“雅近东坡”并不是其词“疏快平博”,而是其词中承苏的旷逸神韵。“绵丽婉约”的吴激词为金人承继较少,“高情远韵”的蔡松年词却奠定了金词学苏的基调。从蔡伯坚词对苏词的承继中也可看出其后金词的分化,得苏词精髓的蔡伯坚词实已含苏词中旷逸豪放之境和缠绵婉约之心的神韵,在其后的金中期词中表现为承平时代词风的多样化,在金末典型地表现为元遗山词中雄放而不失蕴藉的词风。冯煦为朱祖谋注《东坡乐府》所作的序言中谓:“东坡刚亦不吐,柔亦不茹,缠绵芳悱,树秦、柳之前旂;空灵动荡,导姜、张之大轂。唯其所之,皆为绝诣。”^[23]这可以说是对东坡词“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风格的最好概括。东坡词的多重风格意蕴来自于其儒、道、释杂合的多重思想触发不拘一格的多重思维,苏学虽被批评为“混杂”,但其体系于文学多重思维的触发却是有益的。

“北方金元词坛主要继承了北宋词人苏轼‘以诗为词’的观念和豪放旷逸的词风,但北宋传统的婉约体及南宋南宗词在北方词坛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特别是在艺术技巧方面使北方词坛多所获益。”^[24]在金初词人对苏词旷逸之境的接受中,北宋传统的婉约体特别是苏词中的婉约体对金词其后风格的多向形成有着潜在的影响。

金末元遗山“以诚为本”、“吟咏情性”的词学思想和兼豪放与婉约为一体的词作是其“追配于东坡”又不束缚于苏学精神的最好体现。元好问(1190 ~ 1257),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元德明之子,兴定三年进士。天兴初,入翰林知制诰。金亡不仕。刘敏中的《江湖长短句引》中论道:“(词)逮宋而大盛,其最擅名者东坡苏氏,辛稼轩次之,近世元遗山又次之。三家体裁各殊,并传而不相悖”(《中庵集》卷九)。元遗山的《新轩乐府序》云:“唐歌词多宫体,又皆极力为之。自东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虽时作宫体,亦岂可以宫体概之?人有言乐府本不难作,从东坡放笔后便难作。此殆

以工拙论,非知坡者。……自今观之,东坡圣处,非有意于文字之为工,不得不然之为工也。坡以来,山谷、晁无咎、陈去非、辛幼安诸公,俱以歌词取称,吟咏性情,留连光景,清壮顿挫,能起人妙思;亦有语意拙直,不自缘饰,因病成妍者,皆自坡发之。”^[25]自谓“诗中疏凿手”的元遗山并不满苏诗的杂体,编成《东坡诗雅》,对苏诗予以清理:“五言以来,六朝之谢、陶,唐之陈子昂、韦应物、柳子厚,最为近风雅。自余多以杂体为之,诗之亡久矣。杂体愈备,则去风雅愈远,其理然也。近世苏子瞻绝爱陶、柳二家,极其诗之所止,诚亦陶、柳之亚;然评者尚以其能似陶、柳,而不能不为风俗所移,为可恨耳!夫诗至于子瞻,而且有不能近古之恨,后人无所望矣。”^[26]翁方纲“当日程学盛于南,苏学盛于北,如蔡松年、赵秉文之属,盖皆苏氏之支流余裔。遗山崛起党、赵之后,器识超拔,始不尽为苏氏余波沾沾一得,是以开启百年后文士之脉。则以有元一代之文,自先生倡导,未为不可”^[27]。郝经认为,遗山诗“上薄风雅,中规李杜,粹然一出于正,直配苏黄氏”^[28]。元遗山正本清源的复雅努力,因着国破家亡的痛楚,尊崇转益多师的遗山词在多重风格的金中期词的基础上一变而为清劲顿挫、雄浑豪迈之音,又化为沉郁凄婉、深厚蕴藉的缠绵低吟。黄兆汉先生在《金元词史》中将金元词划分为6个时期,并认为元初以“悲凉感慨”为创作基调。这种悲凉基调体现着元人的一种壮烈选择中求超脱而不能释怀、冲淡中隐含着激烈情愫的士人品质,与遗山词的国破家亡之哀音和苍凉情感有着内在的一致处,如遗山词《满江红·内乡作》:

老树荒台,秋兴动,悠然独酌。秋也老,江山憔悴,鬓华先觉。人到中年原易感,眼看华屋归零落。算世间,唯有醉乡民,平生乐。凌浩荡,观寥廓。月为烛,云为幄。尽百川都酿,不供杯杓。身外虚名将底用,古来已错今尤错。唤野猿、山鸟一时歌,休休莫。

浙江归路杳,西南仰美,投林高鸟。升斗微官,世累苦相萦绕。不入麒麟画里,又不与、巢由同调。时自笑,虚名负我,半生吟啸。扰扰马足车尘,被岁月无情,暗消年少。钟鼎山林,一事几时曾了。四壁秋虫夜语,更一点,残灯斜照。青镜晓,白发又添多少(《玉漏迟·壬辰围城中,有怀浙江别业》)。

遥想朱旗回指,万里风云奔走,惨淡五年兵。天地入鞭笞,毛发慄威灵(《水调歌头·汜

水故城登眺》)。

遗山词在欲追求自得其乐的心灵适意中,已有一种深刻的闲愁和悲凉充溢其中,“鹿裘孤坐千峰雪,耐于青松老岁寒”(元好问《鹧鸪天·二十七》),“孤峰顶上青天阔,独对春风舞一场”(元好问《鹧鸪天·二十八》);孤傲、高洁之情充溢其中,意境开阔,想象丰富,沉重和悲凉已不自觉地转移在对青天的呼求和自我的孤立之中,有东坡渡海之后的坚韧执着,更有东坡没有的绝望和愤激!

金之后的元词主要表现为冲淡本真之作,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主情致和对言志的一定分离,既是元初文坛的总体趋向,又是继深受苏学影响的金文坛追求自然本真的又一次深化。况周颐曰“余遍阅元人词,最服膺刘文靖,以谓元之苏文忠可也。文忠词以才情博大胜,文靖以性情朴厚胜”^[13]。由此可以看出,从苏轼、元遗山到刘因词的一脉相承的联系:“有时抱膝看青山,却不是、长吟梁甫。”(刘因《鹊桥仙》)“只愁无处著清香,满载月明船已重。”(刘因《木兰花》)“茫茫大块洪炉里,何物不寒灰。古今多少,荒烟废垒,老树遗台……不须更叹,花开花落,春去春来。”(刘因《太常引》)“君试舞,我当歌。不乐欲如何。”(刘因《太常引》)“青云底柱本来高,立向颓波更好。”(刘因《西江月·送张大经》)刘因词中很少直接抒发志向,只是在那些淡淡的抒发情性中,让我们感知到无法掩藏的真情绪。这种感情隐隐约约地散发在其词作中,伴随着刘因的真情实感,使其词在意味深长中有难以言说的悲凉,此复合无奈的情感也是元初文学的主潮。

四、结 语

苏学的接受在金初是士人心理的需要,金中期苏学对于金人已成为一种文化的底蕴,苏学中的多重思想、多重思维的影响在金中期主要表现在对于其诗词中自然超脱心神的向往和追慕。在金中期词中很难见到苏词的影子,苏学的意蕴已渗透在金人的思想中,成为金人信奉的一种哲学。假如说金初的蔡松年词在风格和精神上是承继了苏轼的超旷,金中期的赵秉文承继了苏轼的飘逸,那么元遗山主要承继了苏轼的情性之真。因为重情性,才有金末遗山词不拘一格的个性展露:既有欲寻求超脱的隐逸情怀,更有国破家亡、流离失所所激起的慷慨悲凉之音。

参考文献:

- [1] 黄文吉. 北宋十大词家研究[M].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6.
- [2] 龙榆生. 论贺方回词质胡适之先生[J]. 词学季刊, 1936,3(3):10.
- [3] 夏敬观. 映庵词评[C]//佚名. 词学·五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196-209.
- [4] 王兆鹏. 唐宋词史论[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 [5] 梁启勋. 词学[M]. 北京:中国书店,1985.
- [6] 陈匪石. 声执:卷下[C]//唐圭璋. 词话丛编. 北京:中华书局,1986:4953-4971.
- [7] 脱脱. 金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 [8] 刘 祁. 归潜志:卷12[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9] 元好问. 中州集·中州乐府:卷5[M].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
- [10] 赵秉文. 闲闲老人滹水文集:卷20[O]. 四部丛刊初编缩本.
- [11] 元好问. 中州集·中州乐府:卷2[M].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
- [12] 阎凤梧. 康金声. 全辽金诗[M]. 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
- [13] 况周颐. 蕙风词话:卷3[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 [14] 元好问. 陶然集序[C]//陶秋英. 宋金元文论选.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446-448.
- [15] 吴熊和. 唐宋词通论[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
- [16] 缪 钺. 宋诗鉴赏辞典[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
- [17] 陶 然. 金元词通论[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18] 鍾振振. 论金元明清词[C]//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编委会. 第一届词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4:265-290.
- [19] 约翰·里克曼. 弗洛伊德著作选[M]. 贺明明,译.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 [20] 胡经之. 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 [21] 元好问. 元好问全集[M]. 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
- [22] 赵秉文. 答李天英书[C]//陶秋英. 宋金元文论选.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439-442.
- [23] 冯 煦. 朱校东坡乐府序[C]//施蛰存. 词籍序跋萃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65.
- [24] 赵维江. 北宋后南北词坛互动关系之考论[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3(6):91-96.
- [25] 元好问. 新轩乐府引[C]//陶秋英. 宋金元文论选.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454-455.
- [26] 元好问. 东坡诗雅引[C]//陶秋英. 宋金元文论选.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449.
- [27] 翁方纲. 石洲诗话:卷5[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

“SU Shi’s theory spreading abroad the north” and the development of Jin Ci in Jin Dynasty

HU Mei-xian

(School of Humanities,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SU Shi’s theory spreading abroad the north”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Jin Ci in the Jin Dynasty were expounded in this paper mainly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multiple national cultures in special time and region during Dading and Mingchang period in the Jin Dynasty. The influence of SU Shi’s theory on the Jin Ci in the Jin Dynasty in terms of “entrusting drift with things” and his writing practice. The spirit of detachment from SU Shi’s theory was inherited. SU Shi’s theory was succeeded selectively in CAI Song-nian’ Jin Ci (early Jin Dynasty) and ZHAO Bing-wen’s Jin Ci (in the middle Jin Dynasty) and YUAN Hao-wen’ Jin Ci (in the later Jin Dynasty). The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iterature in the Jin Dynasty was the course of transmission of SU Shi’s theory. The theory was being developed and selected. It is better to consider Jin literature inheriting from SU Shi’s multiple thoughts than from the tradition of SU Shi’s poems.

Key words: “SU Shi’s theory spreading abroad the north”; spreading; inheriting; Jin Ci

(上接第 116 页)

KANG You-wei’s “Sinology education” and its enlightenment for youngsters’ development

HE Shi-jian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31, Jiangxi,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provide ideological resources and practical examples for the current youth cultivation, the practice experience, thoughts and methods of KANG You-wei’s “sinology education” were analyzed through a large number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The analysis suggests that KANG You-wei emphasized education, inherited and carried forward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learning, but not abolished the new learning. He advocated education reform, proposed “extensive learning” and “a combin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elements”, and developed new personnel by utilizing the strength of Chinese and Western knowledge, so as to realize the goal of education power. He attached much importance to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qualit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moral education, intellectual education, physical education and aesthetic education, especially to the moral education. In the aspect of teaching methods, he adopted the “enlightenment method” to lead students to improve their self-learning and self-thinking ability. He also emphasized the “dialogic method”, which included the types of dialogues between selves, textbook-learner, teacher-student and student-student so that learners can share the academic wisdom of thought and improve their abilities of writing and expression. He advocated the “viewing method”, which often demanded students to experience the natural scenery and communicate with others, so as to be influenced and see a wise.

Key words: KANG You-wei; sinology education; teaching method; youth cultivation